

**【中】葛 成 (Cheng GE) 刘 震(Zhen LIU)**

个人简况

葛成，男，1981年生，西安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震，男，1976年生，江苏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编：100084

电话：13911309881

Email: normangc@hotmail.com

## 从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看全球经济危机

葛成 刘震

内容提要：本文从对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析入手，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盲目投资与需求不足两方面。指出1929年大危机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经济衰退，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文章最后提出，只有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加公有经济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力、控制力，才能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恶性扩张，有效预防经济再度出现危机。

关键词：经济周期，有效需求，公有资产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便在繁荣与萧条间交替运行，由此而产生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而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速度日益加快，中国经济再难以像改革开放前那样，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而独善其身。一方面，世界经济波动必然对外向型的中国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与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所采取的每一项经济政策，也对世界经济运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指标性作用。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如何更好的将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与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已经成为眼下经济学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 一、凯恩斯周期理论概述

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甚为深远。依据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危机的产生的基本原因分为两方面，一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在于不着边际的乐观预期的突然破灭。盲目的乐观预期，将资本在资本品市场上的预期收益（价格）推高到一个危险的程度，产生大量泡沫。泡沫的破灭，导致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这一崩溃过程，相对于危机的潜伏与积累阶段，只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突然爆发。危机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导致消费倾向递减。这意味着，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时，全社会的消费倾向是下降的，这就使过度投资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资产价格虚高，另一方面社会实际需求减少，就像是1928年和2007年世界经济的写实照。

1929年大衰退，从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到次年10月爆发银行业危机，美国经济在短短一年之内遭到两次重创，生产力指数、批发物价指数以及个人收入指数分别

下降26%、14%和16%。<sup>a</sup>在对这次危机进行分析时，凯恩斯指出：资本边际效率的恢复，要求消化吸收多余的资本存货。存货的吸收过程，也就是负投资的过程，必然带来就业下降。存货被吸收干净，负投资基本完成，就业才会上升。

凯恩斯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必然带来市场预期与投资者心理的不理性波动，从而产生经济波动。因此，为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安排现行的投资的责任决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在《通论》最后一章里，凯恩斯提出明确的建议：限制资本过渡的索取剩余价值。认为“当资本主义的食利者阶层完成了它的任务以后，它会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而消失掉”<sup>b</sup>。并且看到了，“一旦它的食利者阶层的方面消失掉，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会有重大的改变”<sup>c</sup>。

## 二、金融危机的实质——投资泡沫与有效需求不足

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与1929年的大危机有本质上的区别吗？答案是否定的。从表面上看，经济危机的起源在于美国金融监管不严，高风险的次贷金融衍生品无序发展——当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时，金融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而发生的。可从深层次看，这次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本身。也就是说，危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飞速发展，造成资本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随着全球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分配失衡，资本在少数人手中迅速积累膨胀，这些资本急需寻找投资渠道获得新的利润，于是国际上开始出现大量由对冲基金为骨干的所谓“国际游资”。这股“国际游资”为了获利，在全球寻找机会，并在国际金融市场高速流动，从而间接或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一系列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各国纷纷加强监管，限制国际游资的进出。在这种形势下，包括游资在内的国际金融资本大量回流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对于贸易、财政双赤字的美国来说，资本流入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它却催生了科技股泡沫。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随后，2001年“9·11”事件发生，这两大事件间接为今天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为了应对科技股泡沫破灭引发的经济衰退，为了支持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巨额军费，美国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降息、印钞、巨额赤字等一系列措施在使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美国债务急剧增加，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泛滥，进而推动国际金融资本畸形的暴发式增长。在期货市场，1998年，美国的交易所内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量总共大约为6.3亿手。到2007年，交易量达到32亿手，增长了4倍多。在过去10年内，必须报告仓位的大型交易商的数量，在芝加哥玉米期货市场、小麦期货市场和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市场，增幅分别为43%、116%和74%。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公布的资料显示，投机交易占美国原油期货合约交易的70%。在外汇市场，2001年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额约为1.4万亿美元，可到了2007年，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额就超过了3万亿美元，在短短6年中翻了一倍还多。

a 米尔顿·弗里德曼，《大衰退1929—1933》，中信出版社，2008第一版，第8页

b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2005重译版，第390页

c 同上

另一方面，根据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公布的数据，目前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国民所得（卢森堡44500美元），已经超过最穷困国家（布隆迪100美元）445倍。当然，这只是最极端的例子，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收入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时，1988年、1993年、1998年、2002年这四年的世界基尼系数分别为0.619、0.652、0.642和0.652<sup>a</sup>。这意味着，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时，世界上90%的人占有世界上50.4%的财富，而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人则享有其余49.6%的财富。在以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衡量时，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富有的5%的人占有世界上45%的财富，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世界上67.5%的财富，而最贫穷的5%和10%的人仅分别占有0.15%和0.45%的财富。以德国与主要低收入国家对比为例，2002年德国收入最低的5%的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全世界77%的人的收入水平，比印度最富有的5%的人的收入水平还要高，同斯里兰卡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当。在巴西和中国，分别仅有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人的收入水平处于德国这5%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这样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必然造成有效需求的减少。

综上所述，资本的过度扩张与有效需求的减少，造成了市场实际需求无法满足资本投资需求。这时，庞大的、疯狂追逐利润的国际金融资本就会推动金融衍生品不断创新，制造出高杠杆、高风险的以次级贷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由于这种创新已经完全脱离了生产和供需基本面，产生大量过度投资，因而使金融市场上弥漫着盲目乐观的情绪，人们对资本收益率的预期完全偏离了资产的实际价格。当07年底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时，迅速引起金融行业的资本边际效率崩溃，股票市场迅速崩盘，其速度比1929年的大危机更快，其破坏性也更强。

### 三、公有制——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

那么，如何医治经济衰退，消化繁荣阶段产生的过度投资，同时刺激消费呢？比如提高利息率，限制资本的恶性膨胀？又或者采取抑制投资的政策，把资本搅乱全球经济的“出口”堵死？事实上，从“危机是由不理性的私人投资所引发的”这一点来看，我们根治危机的手段还是要落在扩大消费以消化存货，以及促使投资更为社会化这两点上面。

首先，我们应该在于采取更大胆的步骤，包括分配再分配手段，刺激消费倾向。我们已经看到，例如台湾当局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都已经施行了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从发放消费券，到扶植本土消费服务业，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政策都不是刺激消费的关键。我们认为，不解决分配领域出现的主要矛盾，刺激居民消费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临时的扶植和刺激政策，最多只能起到短期的促进作用。在长期中，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了分配领域的不平等，全社会的消费才会回到她应该处于的正确轨道上。在目前来看，要使分配更为公平合理，最直接的办法就在于增加二次分配的调节规模。只有扩大国家政府对整个经济分配过程的调节规模，才能让全社会所得在各

<sup>a</sup> Branko Milanovic, 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1988 and 1993: First Calculation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s Alon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2, No. 476

个阶层中间更合理的进行分配。

其次，我们所面临的过度投资，只是相对而言，因此关键并不在于抑制投资，而在于引导投资。严格意义上的过度投资，应该是：任何进一步的投资都只能是对资源的浪费。事实上，又有多少行业部门存在过度投资呢？答案是极少的。因为大部分私人资本在利润的驱使下，盲目的投向有限的几个产业。这些产业，因为其获利性较高，往往都是被资本追捧的，所谓过度投资，也只能在这些部门中形成。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贸加工产业。在世界经济一片景气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每年都以20%以上的数字增长，大量投资涌入外贸及相关产业。而当世界经济趋于萧条时，外贸产业的萎缩也几乎不受控制，让人感觉这都是过度投资惹的祸。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国距离绝对的宏观投资过度，还有相当远的距离。除了少数部门之外，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产业与公共服务，其投资规模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往往面临着投资不足的窘境。这一切并不能怪罪私人投资，因为他生来就是逐利的，这是他不能改变的秉性，和必须承担的原罪。因此，我们认为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种种问题，让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走出这一困境的第二个手段，就在于扩大社会投资的公共部分，让国家掌握更多的资源，发展和壮大公有制。

以上两点的分析，都把公有制看作有效医治经济危机，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在现实中，中国拥有超过16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头寸，虽然不能简单的将其作为有效需求的表征向量，但毕竟大规模存差的存在，代表了银行系统无法将全部的存款转化为贷款发放出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社会资源的闲置状况。这样大规模的资源闲置，单靠私人投资显然无法消化。如果可以将这一闲置的资源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并由这一支出带动私人投资成倍增长，将有效解决中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同时，以公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将原本专属于私人资本的市场收益，划分一部分为公有资本所得，并将此所得用于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建设，不但可以建立健全我国目前的医保社保体制，更会改善收入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改善人民生活，可谓一举多得。